

---

# 桑梓荣誉、现实利益与权力规约

## ——新乡贤组织慈善的历程与逻辑

姜亦炜<sup>1</sup>

**【摘要】**在“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等研究方兴未艾的当下，政府与公益慈善组织的互动依然是理解如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轴。从“行政吸纳社会”到“治理吸纳慈善”的知识脉络下，“项目规约慈善”可能是其在地化实践的最新版本。本文采取多个案过程分析，对浙北浙南四个村庄的新乡贤组织慈善发展历程做了集中呈现，首先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了早期的“分散自发式”、中期的“基金会式”与晚近的“项目认领式”。其次探讨了历程背后以桑梓荣誉为代表的民权逻辑、现实利益考量的绅权逻辑与政府权力规约的政权逻辑的三重互动。最后对经验现实进行了分析，认为项目制对于治理的总调控性，使得公益慈善组织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通过基层政权与新乡贤组织双向赋权，桑梓荣誉、现实利益与权力规约的动态平衡，形成了一种更柔性化与隐性的社会吸纳模式：项目规约慈善。

**【关键词】**桑梓荣誉 现实利益 权力规约 新乡贤组织 慈善 项目规约慈善

国人对于故乡有一种特殊情感，掺杂着面子、荣誉、虚荣、骄傲等等，司马迁在《史记》里有一段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恰如其分地反应了这种特殊的情感。情感之与理性往往被认为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如马克斯·韦伯、塔尔科特·帕森斯。<sup>1</sup>但是最新情感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理性，更具体的讲，人类的决策依靠情感。没有情感，人们不能把握选择的效价或效用。<sup>2</sup>

今天越来越多的乡镇村落召唤起一个带着传统意蕴的现代群体——新乡贤，并将其组织化，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各类行动中，他们参与决策咨询、争取项目、招商引资、行政辅助、社会治理等各种事务，<sup>3</sup>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慈善公益事业，这自然是基于一定的情感价值所做的理性选择，被有些学者称为“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Noblesse oblige）。<sup>4</sup>但是在我们为为期六年的新乡贤组织访谈调研中发现，其背后的逻辑不仅仅是这些农村精英“本乡本土的地方主义荣誉道德观”，<sup>5</sup>亦或者基于桑梓荣誉的情感投资。而是一种由桑梓荣誉的道德情感起始，同时结合了乡贤群体现实效用考量与基层政权权力规约的三重互动。

本文采取了多个案过程分析，对浙北、浙南四个村庄的新乡贤组织慈善演化过程做了集中分析。发现其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早期阶段以分散自发形式为主，乡贤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按照自身的兴趣，投身家乡慈善公益事业；中期阶段形成了新乡贤组织下辖的以专业性基金会形式出现的慈善形式，如治水基金、教育基金；后期持续至今的是以项目认领制为具体形态的慈善组织形式，形成了“需求”和“资源”的双向认领，建立了需求、资源和项目三张清单。正是在这三个阶段的演化过程中，桑梓荣誉为代表的民权逻辑、现实利益考量的绅权逻辑与政府权力规约的政权逻辑，三重互动得以呈现。

###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 2016~2021 年间在浙江省长期田野调查。主要采取案例研究法进行，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

<sup>1</sup>作者简介：姜亦炜，博士，湖州师范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州 313000）

<sup>2</sup>基金项目：浙江省哲社规划 2022 年度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1YJC84000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中的新乡贤组织参与研究”的阶段成果

第一、因为本研究所涉及的概念是有关特定情感与心理文化的实践，因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无法被简单“裁剪”成相对孤立的“变量”。而唯有通过定性研究来“保持其复杂性和整体性，并在其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得到研究”。<sup>6</sup>第二、为了对实践对象进行更丰富细腻的描述，本研究将细化分析新乡贤组织慈善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殊表征，这是已有文献没有深入探讨的内容，需要使用探索性方法深入研究。<sup>7</sup>正是基于以上的考量，本文选择采用案例研究法，同时挑选了浙南、浙北两地的四个村落。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主要来源于半结构访谈，辅以当地政府村社提供的政策文件与内部档案等。作者所在的调研小组于2016年7月第一次赴浙北浙南四村开展集中调研工作，之后基本每年安排两周时间回访四村，即使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调研仍未中断，一直持续到2021年。访谈主要包括：政府官员、村两委成员、新乡贤组织成员（本土乡贤、外出乡贤、外来乡贤）与普通村民四类人群。根据这四类人群分别设计了访谈提纲，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村社基本情况，包括村面积、自然村数量、与县城的距离、村人口（户/人）、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红情况、主要产业、产业结构、村人均收入、是否“一肩挑”、村官中党员比例、村两委成员数、村党员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风俗、地方节庆、庙宇（民间信仰场所）、姓氏、祠堂等。新乡贤组织参与公益慈善的现状，分别从效果（目标完成情况）、效率（现实的收益）、效应（社会影响如何）三点来扩展询问。新乡贤组织参与公益慈善的不同逻辑、路径、动力，所产生的需求，发挥的作用。新乡贤组织参与公益慈善的典型案例分析，从背景、过程、绩效三方面展开。普通村民对于新乡贤组织参与公益慈善的认知、情感与评价等。最终获得时长2450分钟的有效访谈录音，并整理出20万字的访谈资料，为接下去进行案例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

## 二、新乡贤组织慈善的历程与逻辑

虽然新乡贤组织（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最初在广东云浮、浙江德清等地以一种内生型的方式演化，但是即使是在最初的形态中，村两委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up>3</sup>及至后期在得到中央肯定后，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更加重视此项工作的意义，在统战、民政、农业农村多个口径同时推进新乡贤组织的推广复制工作，按照我们访谈的某统战部官员语，“形成了县（区）-镇（乡）-村的三级网络，并在全省铺开。”

但即使在“政府主导”“党委推动”下，很多政策或指导意见也很难落实，这就是“政策扩散”中的失灵问题，<sup>8</sup>新乡贤组织之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生根发芽，必然是实现了个人意愿、社会基础与政府意图的某种切合。<sup>9</sup>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某种互动关系的存在。在我们的调研观察中，新乡贤组织慈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 （一）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早期阶段（2011-2015年）：分散自发式

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最早阶段，大致始于2011年，这与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等新乡贤组织成立时间大致平行。最初这些组织主要承担的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相关事宜，并未涉及慈善公益。但是事实是这些新乡贤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回乡的，总是最乐意为大家架桥铺路、扶贫助学。与一百年前一样，“他们总是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sup>10</sup>这种“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与地方主义荣誉道德观，驱使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维系这样的乡土联结与地方利益。

在最初阶段新乡贤组织慈善的形式是松散的、自发的，多围绕村庄切近困难与乡贤自身的兴趣与认知展开。如访谈中了解到华张村的乡贤就出资帮助村里建设了老年食堂，解决了村里老年人吃饭的问题。据当地镇统战干部介绍上面会有一些补助资金，但补助资金远远不够运行，所以就是通过乡贤筹集资金，帮助老年食堂正常地运转起来（旧桥镇统战干事 X05 访谈记录 20170108）。

也有结合一定的礼仪形式，通过开学典礼发放奖学金助学金的事例。<sup>11</sup>这个教育奖学金是由从本村出外求学，复旦毕业并留美的乡贤设立，资助贫困中学生与学习优良的中学生，据村干部介绍通过这几年的奖助学，该校的高考成绩提升不少，学校建设也被带动起来（河尾镇百布村村干部 D01 访谈记录 20170110）。

---

因为其松散与自发的属性，形式也会更多样，有一种书画展慈善义拍的形式，乡贤将自己收藏的书画字帖在乡贤大会上展览拍卖，然后筹得的善款用于本村或社区的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等工作。还有一些慈善公益事业，虽然看似零碎，却是国家或政府层面无法延伸的，正所谓“盖官有更替，不如绅之居处常亲”。<sup>12</sup>本地的乡贤往往能关注到很多政府很难察觉的细节，在华张村访谈时，一位村干部就曾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关于当地新乡贤组织为老年人提供专车司机出行服务的案例。

在这类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早期阶段，基层政权也不是隐身的，至少在两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方面新乡贤组织本身，具有基层政权影子，从组织结构看村干部一般会在新乡贤组织中任职会长或秘书长，<sup>14</sup>这或多或少会影响新乡贤组织慈善的决策。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也会统筹资源，组织一些活动，凝聚共识，如“我的村庄我的梦”活动等。

可以说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早期阶段可以称为“分散自发式”。乡贤出于自身的故乡情结，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按照自身的兴趣，自发地为家乡慈善公益事业服务，它相对来说组织性与效用比较弱，但是在乡贤情感的激发上仍是强的。

## （二）新乡贤组织慈善的中期阶段（2016-2018年）：基金会形式

草创阶段的新乡贤组织慈善虽然形式多样，毕竟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没有形成制度化、持续性的慈善供给，在慈善的各项领域上也是给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感觉，犹如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容易扎堆在一些领域，而忽视更广阔的空间。2016年后，新乡贤组织慈善逐渐向中期阶段发展，其主要特征为各类新乡贤组织旗下的基金会应运而生。

最早设立的是教育基金会，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符号资本的象征作用总是最容易为精英慈善所眷顾。<sup>13</sup>按照一位浙北基层统战干部的表述，到2018年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教育基金会已经成立了11家，募集了660多万元，几乎涵盖了所有村社。最早成立教育基金会的和美镇芦港村乡贤这样说明当时设立教育基金会的初衷：

在教育方面，现在村里面都有教育基金会。我们村里面的20来位乡贤，自己出资40万左右，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就是为了奖励村里面成绩好的学生，还有家里条件不大好的学生，总感觉这二十年来，老家出的人才都是因为教育出来的，在以前，没有这个组织，很难做成，村干部去说的效果，肯定没有我们乡贤自发组织的效果好。（和美镇芦港村乡贤会成员 T02 访谈记录 20180111）

乡贤会与商会的不同在于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商会只限于从商的企业家等，而乡贤会则包含各行各业的贤达人士。据我们调研的一位乡贤会会长介绍，他们乡贤会有187人，通过前期排摸，确定进入的名单，其中从政人员有85名，高校教师有9名，科研人员有11名，从军人员有1名，经商人员有70名，其他各领域比较突出的人员有11名。乡贤会下设的基金会所包含的面更广，除了捐赠之外，还有很多以提供服务的形式进行慈善公益事业。

除此，这类基金会的设立使得早期随机性的、不定期的、分散的新乡贤组织慈善变得更加具有制度性与专业性。<sup>14</sup>如河尾镇百布村的公益慈善基金，细则如下：

### 河尾镇百布村公益慈善基金使用细则

敬老爱老，重阳节给予村80岁以上（含）的老人每人慰问200元。

奖学奖优，每年考上金华一中的学生奖励2000元，考上二中、艾青中学、汤中、金外高中部的学生奖励1000元。考上清华、北大等全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奖励10000元，考上985、211（双一流）大学的学生奖励5000元，其余考上一本的学生奖励2000元。

---

历史文化挖掘需经费支出，一事一议

扶贫帮困、天灾人祸慰问，一事一议

见义勇为奖励，一事一议

五经拳传授，每教会一名学生经考核通过，奖励师傅 50 元。

不难看出，在这一细则中不单将慰问与奖励的等级以及对应的金额做了详细规定，还对于本土的特色事项作了规定（如五经拳传授）。制度化意味着可预期，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则意味着在地化实践的拓展。

除了广泛性、包容性与一定的专业性外，这类基金会还有另一个层面的特点，即特别注重培养良好的乡风文明，弘扬社会美德。在四个村访谈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乡贤会成员，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这些基金会的弘扬美德、道德引领上。河尾镇百布村乡贤会长就曾这样阐释他们基金会的特殊功能：

在基金会设立上，我们重在弘扬美德，帮困助贫。我们基金会，虽然总额不大，筹集了 100 万，但是资金的作用发挥上，我们是以道德模范为主。以前我们百步，民风比较彪悍，之前呢，什么搓麻将、赌博什么比较多，希望通过设立这个基金会，一方面是延续重教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引导文明的社会风气。（河尾镇百布村乡贤会长 X01 访谈记录 20180113）

总结一下，新乡贤组织慈善的中期阶段可以称为“基金会形式”。即以新乡贤组织下辖的专业性基金会形式为典型的慈善形式，具体如治水基金、教育基金、慈善基金等。它相对于早期的分散自发式在广泛性、制度化、专业性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并且它特别注重乡风文明、社会美德的引导，在组织性与效用处于中间位置。

### （三）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晚近阶段（2018-2021 年）：项目认领制

随着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持续开展，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基层政权开始有意地引导与规制，即保护乡贤的返乡之情桑梓荣誉，又维护基层政权的权威。用基层政权的话语就是“乡贤慈善工作要结合家乡建设，结合群众需求，结合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重要项目。”之后如乡贤认领慈善公益微心愿制度、“千名乡贤帮百村”慈善公益项目认领制度等应运而生，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政府出慈善项目清单，乡贤来认领这些清单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生态保护、联村公路桥梁建设、特困家庭补助、助学助困校园建设、民生实事、山区脱贫、民族团结创建提升、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等等。“现在就是每年把计划的项目呈现出来，然后让他们根据兴趣进行对接。”这其中“呈现”与“兴趣”二字非常重要。“呈现”意味着基层政权有主动性可以因时因地的调整哪里可以释放出一定的慈善空间给予民间，“兴趣”则意味着乡贤也有自己的主动性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慈善领域，不管是出于桑梓荣誉的目的还是自己个人利益的考量，但是他的选择是在一定的权力规约之内，而不是松散随意地开展。

可以通过两个案例：乡贤认领慈善公益微心愿制度与“千名乡贤帮百村”慈善公益项目认领制，进一步了解其特征。

乡贤认领慈善公益微心愿制度始于 2018 年，由旧桥镇乡贤联谊会发起倡议，各村乡贤联谊会具体展开，我们可以通过变迁更直观地了解其特征。两年度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的，主要就是通过慈善活动培育责任感，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领方式也基本没有变化，年初的“微心愿征集表”，到乡贤认领项目，再到执行。变化的是认领的内容，从 2018 年的服务基层工作、服务百姓生活，到 2019 年的服务美丽乡村、服务乡风文明与服务产业发展。可以说这种慈善项目认领制是随基层政权中心工作的转移，而不断变化的，即在一定的权力规约内认领慈善项目。

“千名乡贤帮百村”慈善公益项目认领制，则意味着项目认领制的最终定型，其核心是三张清单：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项

目清单。年初，街道、乡镇党委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走访、集中座谈等方式，了解群众的需求，并结合政府中心工作形成公益慈善需求清单；同时，梳理出新乡贤组织或乡贤个人能够提供的资源，形成资源清单；最后，通过举办公益慈善项目对接会、搭建“公益慈善项目超市”等，促成“需求”和“资源”的双向认领，建立起公益项目认领清单。

笔者选取了调研四个村的认领情况作了汇总，认领的慈善公益项目种类繁多，但是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类：“公益基建”、“教育帮扶”、“生态保护”、“扶老救孤”。这些项目一方面体现的是民生需求，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一个时期政府的中心工作。比如公益基建类的项目对应了政府关于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的追求；教育帮扶中体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乡村振兴的意图；而生态保护类目中，则与当时的垃圾分类、五水共治等中心工作切合；最后扶老救孤，特别强调了居家养老的政策特征。在“千名乡贤帮百村”慈善公益项目认领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权力规约的存在。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人类的决策依靠情感。没有情感，人们不能把握选择的效价或效用。<sup>15</sup>如果仅是规约，新乡贤组织慈善无法持续，很多民间组织在行政干预下日渐消亡，新乡贤组织慈善之所以持续下去，在于基层政权在适度规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留和激励了这种桑梓荣誉的存在。“荣誉安排聚人心，发掘典型树正气”，基层干部这样介绍慈善公益项目认领签约仪式的盛况，“我们注重人心的回归，让乡贤人才聚起来。我们的出发点是传统的联络、联谊。春节期间是乡贤工作的黄金时期，需要发挥传统节日的集聚作用。我们都会年初春节的时候举办慈善公益项目认领签约仪式，利用乡愁纽带筹善款、做公益”（禹月镇基层干部 S02 访谈记录 20201014）。

总结一下，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晚近阶段可以称为“项目认领制”，即通过举办公益慈善项目对接会、搭建“公益慈善项目超市”等，促成“需求”和“资源”的双向认领，建立起项目清单。这种形式既强调政府权力的规约，尽可能实现资源与需求的匹配，又积极地调动了乡贤们的情感价值。可以说在情感、效用与组织性上都比较强。

#### （四）新乡贤组织慈善的三重逻辑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新乡贤组织慈善变迁的描绘，我们可以发现其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早期阶段以分散自发形式为主，乡贤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按照自身的兴趣，投身家乡慈善公益事业，情感强，组织性与效用弱；中期阶段形成了新乡贤组织下辖的以专业性基金会形式出现的慈善形式，如治水基金、教育基金，其表现为情感强，组织性与效用处于中间位置；后期持续至今的是以项目认领制为具体形态的慈善组织形式，形成了“需求”和“资源”的双向认领，建立了需求、资源和项目三张清单，情感、组织性与效用皆强。正是在这三个阶段的演化过程中，新乡贤组织慈善中桑梓荣誉、现实利益与权力规约的三重互动得以呈现。

##### 1. 桑梓荣誉：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民权逻辑

新乡贤组织慈善的第一层逻辑是桑梓荣誉，反哺乡里，即“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与地方主义荣誉道德观，驱使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维系这样的乡土联结与地方利益，“为民请命”造福一方百姓，进行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等工作，可以说追求荣誉的渴望提供了公共产品-公共利益。<sup>16</sup>它在客观上体现了一种民权逻辑，出于对自己地方社区的自豪感，他们用一种公共的善意维系了社区服务的蓬勃发展，并促进了普通百姓的社区福祉。作为一种代表地方利益的力量，他们是民众的化身，不惜做出一定的个人牺牲，形塑本地社区的道德生态。同时通过这些公益慈善事业，也反向确认了其本土精英的合法身份，可能正如 Creed 所言，人靠衣装，精英慈善的最核心意义在于精英身份的合理化社会建构。<sup>17</sup>

##### 2. 现实利益：新乡贤组织慈善的绅权逻辑

当然新乡贤组织慈善还有它的第二层逻辑现实利益，除了利他主义的、地方荣誉观的奉献之外的一层逻辑，即自身利益的考量与集团利益的保护，这是一种绅权逻辑。<sup>10</sup>正向的是为了维护地方利益，负面的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分利者的角色，而且在

我们的调研中发现，越是中下层的乡贤，其分利倾向更明显，有时公益慈善只是幌子，他们需要换取更大的利益，通过慈善换取政策倾斜。<sup>21</sup>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提出的“慈善购买好感与宽容”的命题一样，精英慈善“购买”了民众对他们的好感和对权力不对称的宽容，以及接近政治家和官员的门路，以此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税收政策和法律条文。<sup>18</sup>再宏观一点看，新乡贤组织慈善也比我们仅认为的利他更丰富一点，它在实质上将这些精英群体的剩余资金转化为了其他更富价值的资本形式，如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等等。<sup>19</sup>新乡贤组织慈善使乡贤们扩大了影响力和社会联系，提升了其控制当地社区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sup>20</sup>

### 3. 权力规约：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政权逻辑

新乡贤组织慈善的第三层逻辑在于基层政权的权力规约，即基层政权将新乡贤组织慈善整合到地方治理体系中，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部分，服务于政府中心工作，把新乡贤组织的慈善行为框定在一定范围，简单讲就是用“项目规约慈善”，这是政权逻辑。这个逻辑脱胎于“分类控制体系”<sup>21</sup>与“行政吸纳社会”<sup>22</sup>概念，体现了政府对于社会组织、公益行为的控制，即所谓理性政府通过控制和功能替代这两种方式来管理社会组织。但是在新的时代变革下这种政府与新乡贤组织的关系变得更包容共生与参与合作。

### 4. 三重逻辑的合力呈现：民权、绅权、政权的互动

恩格斯曾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合力说”，即“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sup>23</sup>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动机、目的行事，但是历史并不朝着任何一方行事，而是依据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线演进，新乡贤组织慈善也正如是，新乡贤组织的民权逻辑、绅权逻辑与基层政权的政权逻辑，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行事，不管是桑梓荣誉、现实利益还是权力规约，都无法主导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总体进程，而是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交互借力，各取所需（如图1）。



图1 新乡贤组织慈善的三重逻辑

## 三、新乡贤组织慈善的经验分析：项目规约慈善

新乡贤组织慈善经历了分散自发式、基金会式、项目认领式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民权、绅权与政权的三重逻辑，最终在经验层面给我们呈现了一种“项目规约慈善”的终极表现，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 （一）从“治理吸纳慈善”到“项目规约慈善”

不管在经验层面还是理论视野，政府与公益慈善组织的互动依然是理解当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轴。康晓光的“分类控

---

制体系”与“行政吸纳社会”概念依然适用于分析当下政社关系，但是有新的演进变化。按照康氏的观点，理性政府通过控制和功能替代这两种方式来管理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是拾遗补阙，没有太多主动建构的空间。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吸纳需要行政成本，而当下的政府首要解决的是经济与城市发展，所以无暇或者没有过多的资源来重新吸纳社会。<sup>24</sup>这导致了大部分的政社关系还是呈现出合作的趋势，特别是在新时代。而国家基础能力的发展，也使得行政控制的柔性化与隐性化成为可能。<sup>25</sup>所以朱健刚等人提出了“治理吸纳慈善”的概念，<sup>26</sup>即将公益组织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部分。

但是笔者认为“治理吸纳慈善”只在宏观上提出了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更新版的假设，而没有在经验层面给予一种在地化实践的现成版本，即到底如何实现“治理吸纳慈善”？项目规约慈善，可能是一种现实解答。这种通过举办公益慈善项目对接会、搭建“公益慈善项目超市”等，促成“需求”和“资源”的双向认领，建立起项目清单的形式。既强调了政府权力的规约，又积极地调动了乡贤们的情感价值，可以说体现了政治吸纳与包容共生，在社会组织慈善上的现实运用。

## （二）基层政权与新乡贤组织的双向赋权

这种以项目规约慈善为表征的新乡贤组织慈善体现了基层政权与新乡贤组织的双向赋权过程。一方面国家或政府有效汲取了社会资源，通过“需求”与“资源”的双向认领，将国家或基层政权所需与民间社会资源产生了联结，并通过项目将社会慈善规约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地为国家战略或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新乡贤组织也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进一步证成了自身的合法性，并提升了自己的战略地位。正是有了这种积极的互动，才使得此种形式的公益慈善活动得以持续开展。

## （三）桑梓荣誉、现实利益与权力规约的动态平衡

要使得新乡贤组织慈善保持持续的运转，需要基于桑梓荣誉、现实利益与权力规约的动态平衡，即以桑梓荣誉反哺乡里为表征的民权逻辑、以自身利益与集团利益为考量的绅权逻辑、以基层政权的权力规约为考量的政权逻辑，三种逻辑的交互作用与动态平衡。它最大的秘密在于项目认领制的独特属性：总体纲领性与因时因地的灵活性之间的平衡，制度原则性与政策可塑性之间的平衡。需求清单的设定往往首先考虑国家大政方针的刚性需求，如“乡村振兴”“五水共治”“垃圾分类”等等，但是也会结合当地的民生福祉建设小项目，甚至也会考虑乡贤群体自身的诉求设置一些。另一方面在认领清单时，乡贤们也不是做必答题，而是做选择题，在有限度的自由选择中寻找荣誉与尊严。

# 四、讨论与反思

有学者将慈善定义为国家权力允许或认可的，人们自愿地、不计回报地通过自己的钱财物来改善贫弱群体生活的行为，而将社会公益慈善定义为那些政府权力无暇顾及的领域。<sup>27</sup>虽然这样说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却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轴呈现了出来：政府与公益慈善组织的互动。

本文即是基于这样的主轴，借新乡贤组织慈善演化过程的实证分析，探讨政社关系背后的权力互动。虽然这种模式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但是有几点还是值得关注：第一、精英慈善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功能。<sup>28</sup>正如美国一个学者做的长期跟踪调查，<sup>29</sup>美英两国的精英慈善（富裕人群自愿为慈善事业投入大笔资金）使精英群体的控制力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和政治领域，固化并延续了不平等，而非缓解了不平等。<sup>30</sup>精英慈善偏爱投资高等教育和文化艺术领域。<sup>31</sup>这在新乡贤组织慈善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优秀的乡贤喜欢为优秀的本土学校捐款，为优秀学子捐款，而优秀学子毕业后找到优秀的工作又倾向于给自己母校捐款，这就形成了一种优势循环。<sup>32</sup>第二、新乡贤组织慈善中的权力俘获与制度套利问题。一方面基层政权对于新乡贤组织慈善的深度介入，让人们不免担心权力俘获与吏绅共谋的可能；<sup>33</sup>另一方面新乡贤组织通过慈善所扩大的影响力与社会联系，足以部分地控制本地社区政策走向，这为制度套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把行动定义为理性与感性的, 塔尔科特·帕森斯把行动看作“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和“表达性的”(expressive)。

2 Damasio, Antonio R.,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the feeling brain*. Orlando, FL: Harcourt, pp123-134.

3(8)14 21 姜亦炜:《政治影响力与制度生成——新乡贤组织的演生及其类型学》,《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3期。

4 Yan xiaojun, “To Get Rich Is Not Only Glorious”: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New Entrepreneurial Party Secreta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0 (June 2012).

5 阎小骏:《中国何以稳定? 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9-41 页。

6 正如风笑天(2017)所言, 定量研究的方式就像点对点的飞机航线, 但是社会生活中有很多飞机到达不了的小街小巷小弄堂, 这就需要我们选择更具有适应性的定性研究方式, 它可能是马车、牛车、自行车。风笑天:《定性研究概念与类型的探讨》,《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

7 R. K. Yin,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Method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17.

8(9) Braun D, Gilardi F. Taking ‘Galton’ s Problem’ Seriously: Towards a Theory of Policy Diffus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06;18(3):298-322.

9(10) 张海柱、林华旌:《政策扩散中“政策再创新”的生成路径与内在逻辑——基于 16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2 年第 1 期。

10(11) (20) [美]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 李荣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40 页。

11(12) S. J. Ball, *New philanthropy, new networks and new governance in education*. *Political Studies*, 2008(56), pp. 747-765.

12(13) 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篇》, 卷八二, 第四五页载, 惠庆:“奏陈粤西团练日坏亟宜挽救疏。”载[美]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 李荣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42 页。

13(15) 孙贵平:《符号资本、自主场域与中国高等教育“精英慈善”——基于 2016-2018 年的大额捐赠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

14(16) H. K. Anheier,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8(62), 1591-1602.

15(17) Damasio, Antonio R.,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the feeling brain*. Orlando, FL: Harcourt, pp123-134.

16(18) [美]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 冯克利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

第 8、7 页。

17(19) W. E. D. Creed, M. A. Scully, & J. R. Austin, Clothes make the person? The tailoring of legitimating account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13), pp. 475-496.

18(22) C. Thompson, Philanthrocapitalism: Rendering the public domain obsolet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8 (39), pp. 51-67.

19(23) 张小军:《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0(24) K. A. Goss, Policy plutocrats: How America's wealthy seek to influence governa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16(49), pp. 442-448.

21(25)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2(26) 康晓光、卢宪英:《改革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行政吸纳社会》,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333页。

23(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24(28) 朱健刚、邓红丽:《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25(29) 吴月:《吸纳与控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逻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26(30) 朱健刚将“治理吸纳慈善”概括为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上的依法规制,战略资源上的汲取。其认为治理吸纳慈善是国家汲取能力提升的表现。

27(31) 吴玉章:《慈善:权力的介入》,《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

28(32) 王悠然:《精英慈善对美英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8日。

29(33) Mairi Maclean, Charles Harvey, Ruomei Yang, Frank Mueller, Elite philanthrop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in the new age of inequ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21 Volume 23, pp. 330-352.

30(34) D. Fisher, The role of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in the re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of hegemony: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y*, 1983 (17), pp. 206-233.

31(35) S. Reckhow & J. W. Snyder, The expanding role of philanthropy in education politic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14(43), pp. 186-195.

32(36) Mairi Maclean, Charles Harvey, Ruomei Yang, Frank Mueller, Elite philanthrop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

United Kingdom in the new age of inequ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21 Volume 23, pp. 330-352.

33 (37) 李连江:《吏绅共谋: 中国抗争政治中一只隐蔽的手》,《二十一世纪(香港)》2016年第10期。